

韩孟诗派研究

肖占鹏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韩孟诗派研究

肖占鹏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韩孟诗派研究

肖占鹏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天津八里台南开大学校内)

邮编 300071 电话 23508542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天津宝坻第二印刷厂印刷

1999年6月第1版

1999年6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125

字数:176千

印数:1-1000

ISBN 7-310-01219-4

I·97 定价:10.00元

序

王达津

许多有成就的学者，他们的第一部著作往往是他们读研究院的毕业论文。这类著作提出了崭新的论点，也展示了著者的治学观点和方法。肖占鹏君的《韩孟诗派研究》一书，就是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扩充、修订而成的。

这本书的学术价值，首先在于它的开创性。这是海内外第一部较为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韩孟诗派的学术专著。在此之前，学术界关于韩孟诗派的研究文章有两类，一类是关于这个诗派作家作品的研究。这类文章为数不少，其中多有精到之论，但多是將韩孟诗派某一成员作为文学史上之独立文学现象来观照，而非将其并入特定时代之特有文学群体中去透视，于韩孟诗派整体诗歌思想指向和创作风貌涉猎甚少。一类是对于韩孟诗派的创作特色和艺术追求作综合探讨。这类文章本世纪以来仅寥寥几篇，相对于同时代其它诗歌流派如元白诗派的研究，文章数量实在是太少了。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究其大端，韩孟诸人较为注重主观抒情，像元白诸人那样的为时、为事而作的诗篇相对较少，不能不说是韩孟诗派研究多年来不受重视的客观原因。就这一诗派本身的原因看，韩孟诸人追求奇崛险怪的诗美，艺术旨趣离奇怪异，探寻其整体诗歌思想流向难度较大，以通用的研究方法简单机械地生搬硬套很难奏效。加之这一诗派的研究资料少而零散，仅凭堆砌材料的方法，亦难以完成宏篇巨制。

肖君《韩孟诗派研究》一书在前人和时贤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并深化了这一研究领域，是一部在韩孟诗派诗歌思想和创作实践的整体研究上填补空白之作。举凡这一诗派赖以形

成的社会政治和学术思潮、社会心理背景,这一诗派诗歌思想的渊源及其影响,这一诗派诗人的主观精神世界及其诗歌思想的深层意蕴,这一诗派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独特贡献,以及这一诗派主要作家的诗歌思想和创作方面的特色,这本书均有鞭辟入里的论说,许多见解富于矜创。不止于此,这本书在全面深入地探讨韩孟诗派的形成、发展及其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深广影响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种系统研究的态势与格局。由于这一态势与格局是建构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之上,从而能显现出中唐文化的发展轨迹与特征,进而使人窥见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侧面。

难能可贵的是,这种开拓与创新并不是刻意标新立异的无根游谈,而是在对大量的原始资料的清理辨析的基础上自然得出的结论。肖君读大学时即随我研习中国古代文学和古典文论,后又随我读中国古代文学及文学批评史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前后六年有余。他的硕士论文即选定韩孟诗派的开派诗人孟郊为主要研究对象,进而又以韩孟诗派研究作为博士论文选题。治韩孟诗派数年,术业有专攻。他广泛搜集了韩孟诗派的研究资料,为这一诗派的主要作家分别作了年谱,考证他们的生平、交游,并为其诗系年。阅读了大量的唐代作家别集。他还对这一诗派的周边诗人群体如皎然、顾况、颜真卿等人都下过比较扎实的研究功夫,曾有对这些诗人的专门研究论文发表。这种研究的准备工作(或称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正是学术研究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这本书的学术价值,还体现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上。从广阔的文化背景出发来考察韩孟诗派的形成及其诗歌思想和创作倾向的发展衍变,是这本书研究方法上的一个特色。对于诗歌流派的研究通行的方法是概述其形成的历史背景,探讨这一诗派主要作家的生平、理论主张和创作特色,而后概述其影响。这样的研究方法优点在于能够条分缕析,使研究对象的艺术风貌及其发展过程脉络清晰。不足在于容易流于简单的文学现象的描述,导致资料的堆砌

罗列,难以在审美把握与理论分析上高屋建瓴。本书著者没有完全循着这样一个既成模式规模建构,而是力图从中唐广阔的文化背景出发来考虑和研究问题。如探究韩孟诗派得以形成的历史背景,著者没有停留于简单地描述这一时期社会政治状况,而是揭示学术思潮的相对活跃与开放造成的韩孟诸人诗歌思想的崭新内涵、社会心理的普遍倾斜带来的尚怪时风所引发的士人价值观念的转换对韩孟诗派诗歌思想的形成所起的巨大促进作用。又如,韩孟诗派的审美理想的形成,他们的诗美特征诸如追求“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奭”的骨力劲健的语言风格和创造“容飘清冷余,自蕴襟抱中”的清冷凄寒的意境美,是否存有前代和同代文化因子的传承浸染?如果存有,又是通过何种文化媒介传承浸染的?著者通过对盛唐向中唐过渡时期审美时尚的考察,指出,由杜甫开启的重神骨、尚寒瘦的艺术审美观,标志着安史之乱以后对世事变迁较为敏感的士人审美观念的微妙嬗变。而这种审美观念衍为一代审美时尚,又是通过张璪、萧悦、戴嵩等画家完成。韩孟诸人在人物品评和诗美创造中标榜“骨重神寒”、“寒光映骨”、“清寒莹骨”的审美取向,正是时代审美风尚的集中体现。韩孟诗派在语言风格上讲求“硬语盘空”,追求诗歌境界的清冷凄寒,也是他们感通审美时尚,在创作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再如,佛教在中唐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与士人的关系亦较前代更加密切,但佛教与韩孟诗派的关系,以往研究者均未论及。这一诗派的领袖人物韩愈以儒家“道统”的代言人自居,是排佛的勇士。这一诗派的另一位领袖孟郊也以重建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为己任。表面看来他们都与佛教无缘。本书著者从文化思想史的角度审视中唐时期的复杂的历史现象,参之以韩孟诸人的诗歌思想和创作实际指出,中唐时期禅宗中“周遍环宇”的狂禅一系,它的修行方式直接影响了韩孟诸人的人生态度、行为方式,更及其诗歌思想与创作倾向。韩孟诸人秉承“无法可拘”、“任运自在”的狂禅从而导向“任诞”的个体人格标准的确立和褒扬,构成

了他们的诗歌创作由正统转向怪异的人格基础。狂禅主倡“任心”，对韩孟诗派诗歌思想中“赏”、“玩”、“娱”的观念的萌生及其“放心”、“放意”、重主观的创作观的形成，都有重大影响。而韩孟诗派追求奇险怪异的诗美，正是他们诗歌思想上“放心”、“放意”的必然结果。这样从哲学、美学、文学、心理学等多视角、多层面的研究探讨，从广阔的文化背景出发来探寻韩孟诗派的诗歌思想渊源，亦可称之为广义的文化学研究。在本书第二章的开首部分，著者指出：

某一诗人或某一诗派在文学史上被标举为戛戛独造的东西，放到包拢他们的时代艺术文化的大背景下来透视，往往可以发现其与同时代其它艺术门类某些类项的“共构”特征。发现了这种“共构”，不只使得文学史上承传的关系更加明晰，也会进一步拓展我们的研究视野。而且我们还会惊讶地发现，研究视野不断拓展的过程，也正是文学发展的历史逐渐“还原”的过程。

这样一种将具体的研究对象置于广阔的文化背景下来思考、透视的方法，我们说它对于古代文学研究具有某种方法论的意义，是不过分的。

运用辩证的、贯通的方法来研究和解决问题，是本书研究方法上的又一特色。著者论及皎然诗学与韩孟诗派诗歌思想的传承关系，首先从皎然诗学对韩孟诗派的积极影响的角度，指出皎然诗学中倡教化的创作观、狂放狷介的人生态度和与世殊异的创作态度、主体心造的创作取向、倡言新变的文学精神对韩孟诗派在诗歌思想方面的启迪。同时，又运用辩证的思想方法，指出文学创作实践对理论主张的反弹作用，进一步探究了韩孟诗派诗歌思想对皎然诗学的批判与超越，对皎然诗学中的“中道”美学观及其诗歌理论中“四不”、“四离”、“二要”、“六至”、“六迷”等限制作者创作的自由企向的理论羁锁——指陈，剖析处在文学思想转折时期的文学理论家自身的思想矛盾，指出这是皎然具有创新特色的诗歌思想未

能在其时焕发出生命力和显示出实践品格的原因所在。而韩孟诸人正是在上述几个方面对皎然诗学的条条框框有所突破,唱出了“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若使乘酣骋雄怪,造化向以当镌刻”的尚怪奇的歌声。韩孟诗派在文学史上又被称为苦吟诗派,他们的苦吟主张,以往论者只注意其在语言锻造上的要求,以为仅仅是像晚唐人那样“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的文字功夫。本书著者在广泛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指出“苦吟”首先是“吟苦”,是对诗歌表现对象和创作内容上的要求,并将之与韩愈等人倡导的“不平则鸣”等理论主张联系起来考察,肯定“吟苦”是以抒写一己之穷愁不遇为旨归,在客观上将诗歌导向了较为自觉的主观抒情,强化了诗歌的抒情功能。著者又提出,“苦吟”主张更为重要的理论内涵,还在于提倡人工之美,追求的是一种通过人工的力量努力臻于平淡自然之美的审美理想。这样的研究方法及由此得出的结论,既体现了辩证思维的特点,又能在文学发展史的上下贯通中确立研究对象应有之历史地位,是可取的。

肖君从读大学本科到读研究生,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历寒窗十载,已学有所成。他勤恳好学,敏于思考,博览冥搜,择善而从,又能转益多师,无门户之见,著成此古为今用之作,甚为可喜。至于作者著述的苦心,自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非他人所能道。

是为序。

一九九一年七月一日于南开园

目 录

序	王达津
第一章 韩孟诗派的形成	1
第一节 时代背景	1
第二节 韩孟诗派的形成	7
第二章 审美时尚与韩孟诗派的审美取向	15
第一节 审美时尚的转变	15
第二节 韩孟诗派的审美取向	20
第三章 佛教与韩孟诗派诗歌思想	30
第一节 狂禅与韩孟诗派诗歌思想	33
第二节 佛性说与韩愈的诗歌思想	46
第四章 皎然诗学与韩孟诗派诗歌思想	56
第一节 皎然诗学对韩孟诗派诗歌思想的积极影响	57
第二节 韩孟诗派诗歌思想对皎然诗学的超越	67
第五章 韩孟诗派的精神世界及其诗歌思想的深层意蕴	75
第一节 韩孟诗派的精神世界	76
第二节 韩孟诗派诗歌思想的深层意蕴	86
第六章 孟郊的诗歌思想和创作	97
第一节 孟郊的前期诗歌思想和创作	97
第二节 孟郊的后期诗歌思想和创作	105
余 论 孟郊在韩孟诗派中的地位	120
第七章 韩愈的诗歌思想和创作	126
第一节 韩愈的前期诗歌思想和创作	127
第二节 韩愈的后期诗歌思想和创作	137

余 论 韩愈在韩孟诗派中的地位·····	147
第八章 韩孟诗派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独特贡献·····	152
第一节 提倡“苦吟”·····	152
第二节 追求不美之美·····	161
第三节 创造非诗之诗·····	165
第九章 韩孟诗派的影响·····	171
第一节 韩孟诗派在中晚唐五代的影响·····	171
第二节 韩孟诗派在宋金元代的影响·····	188
第三节 韩孟诗派在明清近代的影响·····	202
后 记·····	218

第一章 韩孟诗派的形成

中唐贞元、元和年间，以韩愈、孟郊为核心的一派诗人活跃于诗坛。这派诗人以“苦吟”为创作旨帆，以追求奇险怪异的诗美著称于中国诗歌发展史。他们有着共同的、明确的诗歌思想指向，创作风貌也大致相同或相近，并且具有较庞大的创作阵容，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诗歌流派。这一诗派，后人或以其首领人物之由命之曰“韩孟诗派”，或以其诗歌思想所呈现出的特色而称之为“险怪诗派”。

韩孟诗派的形成，是中唐时期特定的时代背景下的产物。本章拟通过对韩孟诗派生活时代的社会现实、社会心理、学术思潮的考察，揭示韩孟诗派得以形成的历史原因。并探寻使韩孟诸人凝聚成一个诗歌流派的内在动因，勾勒出这一诗派的形成过程以及大体活动情况。

第一节 时代背景

韩孟诗派生活的中唐时期，李唐王朝正经历着由盛而衰的转折。是时，延续了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已使大唐帝国的元气大受损伤，各种潜在的社会矛盾，至此已表面化和激烈化。统治阶级内

部的权力和财产再分配的斗争，不断削弱着唐王朝的统治力。其中，藩镇割据，为当时众祸之首。自从安史乱后，唐王朝已陷入分裂割据状态，强藩跋扈，列镇相望，而朝廷往往采取姑息苟安的政策，其结果则是“姑息愈甚，方镇愈骄”。特别是河北诸藩镇，疆土、甲兵、政令皆自专之，名为王臣，实同敌国，时刻压迫京师。德宗统治初期的“建中之乱”，又一次严重动摇了唐王朝的统治威势。后至宪宗朝，割据势力虽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打击，但不久藩祸再起，气焰更加嚣张。各地藩帅“自补官吏、不输王税”的现象已相当普遍，他们“举头为城，掉尾为旌”，^[1]与唐王朝分庭抗礼。与此同时，宦官专权，朝政腐败，更进一步加剧了唐王朝的统治危机，德宗、宪宗都宠信宦官，致使“威柄下迁，政在宦人，举手伸缩，便有轻重。”^[2]甚至“人主废立，皆出其可否”。^[3]宦官不仅挟兵权、把持朝政，而且操纵皇帝的废立大权。宦官专权的直接后果，则是导致了朝纲混乱、朝政不修，他们“参掌机密，夺百司权，上下弥缝，共为不法。”^[4]是危害国家、摧残百姓的一股最为黑暗腐朽的势力。陈沆在《诗比兴笺》中说：“唐自中叶，为节度使者多赂宦官得之，数至亿万。……及至镇，则重聚敛以偿负。当时谓之‘债帅’”。社会的动荡和朝政的腐败进一步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激化了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下层百姓不堪深重的剥削压迫，只得背井离乡，沦为流民，“天下残瘁，荡为浮人，乡居地著者不四五。”^[5]为了争取生存，反抗压迫，有的农民甚至铤而走险，聚众起义。这一时期，虽有少数有识者致力变革、消除积弊，先后在经济上实行漕运法、榷盐法和两税法，政治上实行永贞革新，但这些变革都先后夭折、失败了。随之而来的则是社会的更加衰颓、败落以及士人思想上的幻灭、绝望。这，就是韩孟诗派生活时代的大致轮廓。

二

贞元、元和时期，强藩割据，宦官专权，民生涂炭，人人自危。在

这样的情势下，人们的精神高度紧张，社会心理普遍发生了倾斜。为了维持心理平衡，人们只好乞灵于神异怪诞。这种心理的倾斜最早是从皇帝的言行中微妙地表现出来的：

德宗初继位，尤恶卜祝、怪谭之士。及建中末，寇戎内梗，桑道茂有城奉天之说，上稍以时日禁忌为意。而雅闻泌长于鬼道，故自外征还。^[6]

史言李泌“好谈神仙怪诞”。^[7]德宗之所以将他“自外征还”，正是“寇戎内梗”所引起的内心恐惧所使然。德宗皇帝由“尤恶卜祝、怪谭之士”到征召“好谈神仙怪诞”的李泌，从根本上说是朝廷政治的需要，但也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他维持心理和精神平衡的迫切要求。《旧唐书》中载有李绹与皇帝的一段对话：“上尝谓绹曰：‘卜筮之事，习者罕精，或中或否。近日风俗，尤更崇尚。’”而李绹也说：“近者，风俗近巫。”^[8]二人对时下风俗的看法是一致的，那就是崇尚巫怪之风。这种崇尚巫怪之风，从轰动朝野的宰相武元衡被刺一案的前前后后看得就更清楚：

初，八年，元衡自蜀再辅政。时太白犯上相，历执法。占者言：“今之三相皆不利，始轻末重。”月余李绹以足疾免。明年十月，李吉甫以暴疾卒。至是，元衡为盗所害，年五十八。始元衡与吉甫齐年，又同日为相。及出镇，分领扬、益。及吉甫再入，元衡亦还。吉甫先一年以元衡生月卒。元衡后一年以吉甫生月卒。吉凶之数，若符会焉。先是长安谣曰：“打麦麦打三三三。”既而旋其袖曰：“舞了也。”解者曰：“打麦者打麦时也；麦打者，盖暗中冲突也；三三三者，谓六月三日也；舞了也谓武元衡之卒也。”自是京师大恐。^[9]

自皇帝、宰相到普通黎民百姓的人人自危，造成了巫怪之风的盛行，巫怪之风的盛行又加剧了人们的恐惧感和危机感。

这种特定时代的倾斜的社会心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人

的行为风尚和审美风尚。韩愈《谁氏子》一诗，写一士人抛弃老母与妻室，去当道士，直闹得“白头老母遮门啼，挽断衫袖留不止。翠眉新妇年二十，载送还家哭穿市”。他为什么这样不近人情而非要弃家为道呢？韩愈一语道破了他弃家出走的原因和实质：

又云时俗轻寻常，力行险怪取贵仕。^[10]

由此可见，“险怪”已经由恐惧感和危机感造成的内在的心理倾斜，转化成了外在的价值评判标准。这一点也在时人的审美风尚中明显地表现出来。沈从文《中国服饰研究》曾征引郭慕熙《宫乐图》概述中唐时妇女服饰的主要宗尚：“主要特征是蛮鬟椎髻，乌膏注唇，赭黄涂脸，眉作细细的八字式低髻。（唐）前期表现健康而活泼，后期则相反，完全近于一种病态。”白居易讲当时妇女的流行装束是：“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城中传四方。时世流行无远近，腮不施朱面无粉。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妍媸黑白失本态，妆成尽似含悲啼。圆鬟在鬓椎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昔闻披发伊川中，辛有见之知有戎。元和时妆君记取，髻椎面睹非华风。”^[11]元稹也说他元和七年前看到的时髦装饰是：“近世妇人，晕淡眉目，绾约顶髻，友朋修度之广，乃匹配色泽，尤剧怪艳。”^[12]可见当时的社会心理与审美风尚之所在。

这种倾斜的社会心理导致的时代风尚，也表现于当时的文坛风尚中。皇甫湜评及元和文人时曾说：

近世风教偷薄，进士尤甚。乃至有一谦三十年之说。

争为虚张，以相高自谩。^[13]

文士们之所以浮薄相高，争为虚张，言行怪诞，就是因为“一谦三十年”的缘故。这同“力行险怪取贵仕”的行为风尚是相通的。李肇曾指出：“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14]正是对时代风尚的精辟概括。韩愈在《上兵部李侍郎书》中说：“南行诗一卷，舒忧娱悲，杂以瑰怪之言，时俗之好，所以讽于口而听于耳也。”^[15]他在《上宰相书》中又说：“时有感激怨怼瑰怪之辞，以求知于天下。”^[16]正明白

表述了其险怪诗风与尚怪时风的关系。

三

韩孟诗派的形成，还与这一时期学术思潮的相对活跃与开放有关。

唐代的儒学即经学，到了韩孟诗派生活的中唐时期，正由墨守章句、严守家法的汉学系统向空言说经、缘词生训的宋学系统过渡。唐王朝建立后，曾先后颁定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和颜师古的《五经定本》等，企图建立统一的儒学思想权威。时至中唐，随着唐帝国大一统政治体制的日趋瓦解，旧的章句之学的统治也逐渐崩溃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种迥异于传统注疏之学的新学风。

代宗以后，经学出现了许多专门名家，“有蔡广成《周易》、强象《论语》、啖助、赵匡、陆质《春秋》、施士丐《毛诗》，刁彝、仲子陵、韦彤、裴臣讲《礼》、章廷珪、薛伯高、徐润并通经。”^[17]其中以陆、啖、赵《春秋》学派和施士丐讲《毛诗》在当时影响最大，也与韩孟诗派关系最为密切。

中唐著名学者啖助、赵匡、陆质开创的《春秋》学派是一个较有影响的学术流派。在他们以前，《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各自为说，家法很严。他们在治学方法上标举“会通三传”、“以经驳传”，开创通学一途，又拨弃先儒旧说不用，倡导一种“圣人夷旷之体”。^[18]专以己意解释“圣人之意”，提倡“一家独断”的学风，在学术思想上是从旧章句束缚下的解放。^[19]

这一时期的另一位经学名家施士丐，贞元年间曾任太子博士，明毛、郑《诗》，通《左传》，深得朝野士大夫景仰。他解诗与汉代经学家那种墨守师说、拘泥古训的风气不同，与孔颖达“疏不破注”的治学方法亦大相迳庭。他往往凭着自己的理解，空言说经，缘词生训。据韦绚《刘宾客嘉话录》载：

刘禹锡云：与柳八、韩七诣施士丐听《毛诗》，说“维鹤

在梁”。梁，人取鱼之梁也。言鵜自合求鱼，不合于人梁上取鱼，譬之人自无善事，攘人之美者，如鵜在人之梁。毛注失之矣。又说“山无草木曰嵒。”所以言“陟彼嵒兮”，言无可怙也。以嵒之无草木，故以譬之。^[20]

这样讲法，都不同于先儒旧义，以至后来唐文宗批评他是“穿凿之学，徒为异同。”^[21]

人或以为韩愈等人主张儒学复古，提倡“道统论”，是受了儒家思孟学派的唯心观念和伦理政治思想的影响，因而与陆、啖、赵学派在治学方法上走的是两条路。这种说法并不十分确切。韩愈及韩孟诗派其他诗人也受到陆、啖、赵学派和施士丐的影响，这在他们的著述中多有表现。韩愈曾执经考疑于施士丐门下，并写有《施先生墓志铭》，称赞：“先生之兴，公车是召。纂序前闻，于光有耀。古圣人言，其旨密微。笺注纷罗，颠倒是非。”^[22]明确否定繁琐注疏，要求不拘章句，大胆立说。韩愈在《读皇甫湜公安园池诗书后》中说：“《春秋》书王法，不诛其人身。《尔雅》注鱼虫，定非磊落人。”^[23]也明确表示不满于注疏之学。何焯评论这段诗说：“此类是《春秋》大义，忽自韩公发之，殷员外啖氏之家，岂得以专门骄公哉？”^[24]韩孟诗派成员卢仝著《春秋摘微》，韩愈写诗贺道：“《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他认为卢仝这种舍传求经的“事业不可量”。^[25]也指的是那种一家独断的治学方法。樊宗师著《魁纪公》，《樊子》、《春秋集传》，韩愈称赞它们“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26]也含有赞赏其思想内容上不循章句之意。韩愈在解释孔子“温故而知新”时说：“先儒皆谓寻绎文翰，由故及新。此是记问之学，不足为人师也。吾谓‘故’者，古之道也；‘新’谓己之新意，可为新法。”^[27]鄙夷“记问之学”，要求出“己之新意”，可见其对于传统的态度和主张大胆新创的精神。这就使他们的学术思想与大胆背离传统、力主新创的诗歌思想间有了相通和一致处。

中唐时期学术思想的相对活跃与开放，无疑对韩孟诗派的产

生及其诗歌思想的形成起着助产催生的作用。

第二节 韩孟诗派的形成

韩孟诗派是以友谊为纽带，以共同的诗歌思想指向和艺术趣尚为基础，通过诗酒往还、唱酬投赠的方式形成的。诗派的成员，除为首的韩愈、孟郊外，还有欧阳詹、李贺、贾岛、皇甫湜、卢仝、马异、刘叉、刘言史等人。

将这些人凝聚成一个诗派的，首先是他们相同的出身和经历。韩孟诸人皆出身寒微，大都有着多年困守科场和仕途蹭蹬的经历，有的甚至终生膝屈下僚、贫困潦倒。相同的出身和经历使他们相互间产生了强烈的精神共鸣，他们的诗歌思想正是体现这种精神共鸣的一个重要侧面。

大致相类的个性，是将韩孟诸人凝聚成一个诗派的另一内在动因。韩孟诸人皆赋性狷介，愤世嫉俗。史言韩愈“狷直”、^[28]“狂疏”，^[29]恃才傲物，清高自许。孟郊“性孤僻寡合”，^[30]“未尝俛眉为可怜之色”。^[31]李贺更是以个性冷僻著称，偃蹇不欲与世接，乃至有“鬼才”之称。贾岛“狂狷行薄”。^[32]皇甫湜“褊急之性，独异于人”。^[33]刘言史“孤峭”，^[34]“初客镇冀，王武俊奏为枣强令，辞疾不受。”^[35]可见其孤傲之性。卢仝“性亦古介僻”。^[36]马异“赋性亦疏”。^[37]刘叉“俯仰不能与世合”。^[38]生性耿直、“孤傲清狂”、不合于时，是他们共同的个性特征。这种昂藏不群、超凡脱俗的个性，他们在诗中也有自我表述。如：

韩愈：“念余黠书生，孤身无所齐。”^[39]“余黠而狂，年未三纪，乘合加入，无挟自持。”^[40]